

# 晚清同名科学翻译与创作小说的互动

—以《世界末日记》与《法螺先生谭》为例

彭睿玠\*

- 1、绪论
- 2、翻译与创作互动的特殊性
- 3、同名译著间关系的相通性
- 4、结语

## 〈국문초록〉

1902년 량치차오가 ‘小説界革命’을 주창하면서 新小説의 번역과 창작이 대량으로 쏟아져 나왔고, 이 시기에 新小説의 類型도 다양하게 증가하였다. 清末民初에 유행한 小説類型 중에서 이 시기에 시작된 科學小説은 清末의 新小説 연구분야에서 빼놓을 수 없는 연구대상이지만, 科學小説의 번역과 창작을 종합적으로 탐구한 연구논저는 그다지 눈에 띄지 않는다. 과학소설 작가의 사상과 시대사조의 교류, 전례 없는 중국사회의 대격변기에 外來文化와 科學知識을 수용하는 서구문화의 수용성과 중국 본토화가 바로 과학소설의 번역과 창작 속에 여과 없이 표출되어 있는 것이다. 본 논문은 清末 梁啓超의 小説界革命에 호응하여 新聞雜誌에 연재된 《世界末日記》와 《法螺先生譚》의 네 가지 텍스트를 연구대상으로 삼아, 이들 譯著者의 翻譯動機와 創作動機의 相互 聯關性, 그리고 清末科學小説의 翻譯과 創作의 特殊性, 清末民初文學과 小説의 發展에 대한 의미를 ‘문화다원시스템론(文化多元系統論)’과

---

\* 中國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學院 碩士課程研究生

‘譯讀’이라는 當代의 文化翻譯理論을 통해 解釋해 보았다.

핵심어 : 清末, 科學小說, 《世界末日記》, 《法螺先生譚》, 翻譯과 創作, 文化翻譯理論

## 1、绪论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 中国被迫打开通商口岸, 来华西人的活动范围扩大, 而他们所创办的白话报刊也逐渐增多, 以来华西人所办的中文报刊为载体, 西方科学知识被介绍到中国, 造成了技术和思想领域的一系列变革, 在这种科技大潮的推动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也掀起了译介和创作科学小说的热潮。来华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的译作《回头看纪略》开启了晚清士人写作“理想小说”的先河, 可以被视作科幻汉译的试水作品。从1891年起到1917年新文学运动席卷全国这26年的时段内, 有近百部、篇科幻小说得到翻译, 许多知名学者、作家都参与了小说翻译, 在这期间也不乏诸多原创的科幻小说作品, 而《世界末日记》与《法螺先生谭》是这百部科学小说的译著中仅有的同名译创作共存的作品。

因此, 科学小说作为清末民初重要的小说类型, 是研究晚清小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而对于科学小说在晚清的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研究, 却鲜有人涉及。《世界末日记》和《法螺先生谭》作为仅有的译创作同名的小说, 《世界末日记》译作由梁启超翻译, 发表于中国最早专载小说的期刊——1902年10月的第一期《新小说》上, 译者署名“任公”, 包天笑的同名创作《世界末日记》则在1908年8月《月月小说》第十九号上发表,

作者署名“笑”。而包天笑的译作《法螺先生谭》及《法螺先生续谈》，与徐念慈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三文会为一册，作为“小说林科学小说之一”，由小说林社于1905年成书单独出版。徐念慈在作品中署名“东海觉我”，包天笑则署名“天笑生”。全书题名为《新法螺》。

这种翻译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与作品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创作者本人的社会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在作品互动的相关性和差异性中，实质上体现的是作者思想与时代思潮的交锋，以及在变革的背景下对外来文化与科学知识的接受与内化。因此本文结合清末民初的文化背景以及报刊活动，以这四部作品为例，探究译著的创作动机的关联，以及作为清末科学小说译介与创作的特殊性，结合现代性翻译理论，对这一特殊的翻译与创作的互动现象作一解读。

## 2、翻译与创作互动的特殊性

同名的科幻作品之间，本应表达相似的主题，蕴含相似的精神理念，但特定时期下出现的《世界末日记》与《法螺先生谭》却表现出诸多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晚清到民初的翻译与创作小说，在互动中呈现出的动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指在当新类型的文学作品被译介之时，由于外界因素以及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其功能和在国内文学领域所处的地位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伊塔玛·埃文-佐哈在自我构建的文化多元系统中对这一现象做出了阐释，“翻译现象的本质和边界并不是一经给出就永远适用的，而是依赖于特定文化系统内部关系的一种活动。”<sup>1)</sup> 科学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被引入之时，带着有着冲击与改变

---

1) 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处于中心位置文学作品的意图,因此在译介之时,译者便不再处于从属的地位,一方面他主动调节原作与中国文学传统之关联,适应新文学发展之需要,对原作进行改写,另一方面他主动引导基于这一新形式基础上的再造与创作,使科学小说在晚清文学多元系统中,不断从边缘向中心靠近,在这一特殊的时期由从流文学转变为主流文学。因此由于译者的能动性主导,使得这一时期的翻译与创作互动呈现一种特殊性。

作为“新小说”的积极倡导者,梁启超认为,担任启迪民智和推动政治改革的小说也自然包括了外国译介而来的小说作品,在1896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专在第七章论述了作为译介小说的重要性,“苟且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sup>2)</sup>作为发刊第一期的《新小说》,在原创小说之外,也刊载了《世界末日记》和《海底旅行》两部译介作品,将译介小说提到与原创小说等同的位置上。但在众多对未来的社会的畅想保持着“无限理性力量的乐观情绪”<sup>3)</sup>的小说作品中,《世界末日记》却一反常态,唱起“末日”的悲歌,这种看似不合时宜的登场,实际上包含着译者自身对于未来幻想与小说启蒙的矛盾思考。在译介“末日”的同一期上,刊登了梁启超个人对于“未来”中国展望的一部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以维新变法成功六十年之后的中国为图景,用对话的方式畅想未来的繁荣景象,饱含梁启超的政治热情与理想蓝图,与这部同样书写“未来的”译介作品形成鲜明对比。但未来与末日是关系紧密的,未来的尽头便是“末日”,可以说末日是对未来另一层面的想象书写。在《世界末日记》中,就明确提到了作为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迎来的必然结局就是末日,“其进步之结果,达于绝顶,

---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 pp.192-197.

2) 梁启超著/何光宇评注:《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41。

3)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64-71。

世界终末之期，早已至矣。”因此这篇译作是梁借由他人之文字，对于自身创作的未来幻想的一种反拨式的深入思考，一种更全面展现未来图景的方式，“就对未来世界的认知而言，“未来”的“新中国”是其努力的方向；而在哲理的终极意义上，“未来”的尽头却是“世界末日”。科学的“末日”，带给世纪初的国人沉重之感，”<sup>4)</sup>

但与此同时，在这一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依然包含着梁启超借由译介小说来推动小说启蒙，启迪民智目的性。在《世界末日记》中，他将西方的末日观念挂上了佛教色彩，并在其中插入了佛教的意象和词汇，如将地球的毁灭概括为“形”、“相”、“色”、“声”的灭绝，而太空中依存的“无量数”太阳、地球“以全智全能者之慧眼，微笑以瞥见之‘爱’之花尚开。”<sup>5)</sup>，通篇表现出一种浓厚的佛教观念，这种对于译作的风格上的改写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最初译介行为的发生与发展是对于佛经佛典的翻译，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梁启超认为“我民族对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其显绩可得而言也。”<sup>6)</sup>因此，在梁启超看来，一部好的翻译作品不仅要学习西方语言和语法来“达意”，更应该从中国传统的佛经翻译文献中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译介手段与方法来“达旨”，在这一翻译观念的影响之下，《世界末日记》中便倾向于用佛教的表达方法和手段，来塑造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末日”观念。并且在译作小说的同年，梁启超发表了《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公开倡导佛教精神对于国人精神改造的意义和作用，“舍己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sup>7)</sup>

4) 宋雪：《晚清小说中的“末日”与“未来”——梁译《世界末日记》》，《明清小说研究》，2018年第3期，158-177。

5) 梁启超：《世界末日记》，《新小说》第一期，新小说社，1902年，117。

6)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508。

通过传授佛教义理，达到开化民智和统摄民心的目的。不难理解，梁将一部科学书写明显的小说通过增删和意译成为一部“哲理小说”，是有着想要预先将佛学观念通过媒介传达给读者的意图的。

而包天笑之后创作的这篇同名小说则将这种承袭而来的末日思考重新拉回科学的轨道，在此基础上阐释进化论、即宏观上的科学理念到底对人类生活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一种与译作不同的“末日观念”：“故我念太阳系，今虽灭亡，或遇时机，必且复活”，<sup>8)</sup>这种相对直接的态度实质上是一种纯西方科学式的思考模式，这种思考模式与清末民初科学知识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关联。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是以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为载体的，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始就有介绍西方的天文学知识的板块，1872年丁韪良在北京创刊的《中西闻见录》，运用一半的篇幅用以介绍西方的科技知识，之后创刊于1876年由傅兰雅主编的在上海发行的《格致汇编》，是最早以传播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宗旨的中文科学杂志，虽在1892年停刊，但《格致汇编》在知识分子学界的关注度却进一步增加，梁启超在其所撰的《西学书目表》中不仅对其篇文重新进行了归类，还对其中的重要译文做了评述，有着明显的推介之意，进一步推动了科学知识在学界的传播。包天笑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报人，曾亲自创刊《苏州白话报》与《励学译编》来推动晚清时新的各类新思想的传播，用以启蒙民众，因此来自各个领域的西方科学理论自然也成为包天笑所了解和关心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包天笑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考模式，并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来，用一种以科学的视角出发的写作方式去探讨“哲理问题”。并且1897年严复《天演论》出版后，这

7)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载《梁启超全集》(第四卷)，张品兴主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一版)

8) 包天笑：《世界末日记》，《月月小说》第十九号，月月小说社，1908年，5。

部译介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著作给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包天笑本人也从中接触到诸多关于进化论的思想内容，“天演论一出版，这个新知识传诵于新学界，几乎人手一编。”<sup>9)</sup>，使得《世界末日记》将“末日”的到来，改变为一种科学进化之结果，带有一种科学的、理性的、达尔文式的进化论态度。“宇宙万物，虽微尘纤芥，无一秒钟不含其进化之点者。今吾人所处之世界，虽云灭亡，然不过进化之一现象，蜕旧易新而已。”<sup>10)</sup>从这个方面来说，包天笑创作的《世界末日记》，更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小说。

作为翻译者的包天笑与创作小说时相同的是，此时的他也受到同时代小说译介思潮的影响，在译介“科学小说”的大潮下，诞生了《法螺先生谭》的系列译作，相对于《世界末日记》的翻译，体现的是一种比较直接的译介意图。1902年，梁启超率先扛起了“小说界革命”的大旗，变身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受到知识分子的追捧和关注，为了探索新的文类来丰富本国小说创作，翻译者们大量引进国外的通俗小说，以侦探小说，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的数量最高。而包天笑作为这时期中翻译家与小说家的主力军，不仅亲自参与编辑小说刊物，担任《月月小说》和《小说林》的主要编辑，在“时代要求甚殷”的影响下，包天笑也翻译了6部科学小说，《法螺先生谭》就是其中的一部。

而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作为国内第一部科学小说创作，他用文本去普及和探讨了来自于科学书写领域的多种手法，并以一种适用于国人的通俗表达来内化了这一小说讲法，这种体现在这部同名创作中的不同于译作的书写风格，主要源于徐念慈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小说功

9)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219。

10) 包天笑：《世界末日记》，《月月小说》第十九号，12。下同出处不另注释，仅后附书名及页数。

用论”论说的观念上的差异。一方面，徐念慈承认新小说对于民众的启蒙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但是相对于梁启超等人对于其政治和社会性作用的强调，徐念慈认为新小说的翻译和创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的理性与感性思维的塑造与提升，进而达到启蒙民智的作用。在〈小说林缘起〉中，徐念慈曾援引德国哲学家基尔希曼的美学理论来阐释作为科学小说的美学功用：“(邱希孟氏)又曰：‘美之第四特性，为理想化’。理想化者，由感兴的实体，于艺术上除去无用分子，发挥本性之谓也。而月球之环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凡此种种，为新旧社会所公认，而非余一己之私言，则其能鼓舞吾人之理性，感觉吾人之理性，夫复何疑!”<sup>11)</sup>因此，在《新法螺先生谭》中，徐念慈将生涩的科学知识改写成为一种更理想化的内容，用自我的想象力创造出“脑电”、“灵魂漫游”等诸种神秘现象，又用看似科学的方法进行阐释和包装，这种多样性写法的尝试与实践，包含了作者想要通过“科学理想”的传授，来提升民众的感性与理性思维的创作意图，也是科学小说这一类型本土化的重要一步。

### 3、同名译著间关系的相通性

1902年11月《新小说》第1号上刊载了梁启超的翻译小说《世界末日记》，而1908年8月《月月小说》第19号上刊登了包天笑撰写的《世界末日记》。《新法螺先生谭》，由《小说林》书社作为“科学小说之一”于

---

11)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1卷 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36。基尔希曼(Kirchmann, 1802-1884)，原译邱希孟氏，德国19世纪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这本书中包括了包天笑翻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以及徐念慈的创作《新法螺先生谭》。从时间上来看,这四部作品均属于早期的科学小说作品,因此在相似的创作时间下诞生的同名译著,在关系上存在着诸多的相通性。

作为文化翻译理论的代表,翻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用“译读(interpretants)”来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进行的主动改写,以适应译入语文化系统的需求和满足自己的主观愿望。“所谓译读,这既是一个对等(语言差异所允许的在形式和语义上的对等程度)的概念,也是一种小说话语(一种适合描述犯罪行为自然主义)的概念,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过推敲措辞创造出的译文就会是一种独具神韵、意蕴精微的解读。”<sup>12)</sup>在晚清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众多译者所翻译的作品,为了能更好的融入强大的传统文化语境,并由于自身主观要求与客观限制,都将原作品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改写,是一种典型的译读行为。同时带有译者和创作者双重身份的梁启超、徐念慈与包天笑,在将科学小说这一陌生的新文学类型,以翻译和创作的方式进行介绍传播时,都融入了传统文化的多种元素,把科幻想象与科学知识用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书写,在这种改写和创作的同时,出于对小说功能性的考量,又加入自我的观点抒发,使得在《世界末日记》和《法螺先生谭》中,这种“译读”行为表现的尤为明显,成为四部作品的共同点。这种“译读”的发生,有着外部的客观条件和译、创作者本身的主观要求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时代客观条件的限制促使“译读”行为的发生。从翻译的原本来看,两部译作均转译自原著作品的日译本。“梁启超的《世界末日记》注为‘此为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家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然

12)【美】劳伦斯·韦努蒂著/王文华译：《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0。

其所译并非据自西文，而实本于日人德富芦花(健次郎，1868-1927)所译《世界の末日》(1891)，甚至对于原作者的识记，也明显沿袭日译本开端的说明。”<sup>13)</sup>而包天笑的《法螺先生谭》及《法螺先生续谭》是根据大江小波(岩谷小波)所译的《法螺先生》和《续法螺先生》转译的，原作是德国的埃·拉斯伯和戈·毕尔格两位作家共同创作的《敏豪生奇遇记》(又《吹牛大王历险记》，二次转译后的作品，经历两种对译入语国家的适应和调整的原文，“译读”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由两个客观原因，首先是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诸多欧美文学作品，比起原本大多是日译本，一方面是由于地缘的亲近和交通的便利，晚清时期在日留学生众多，因此作为外国文学作品流通的主力军，他们携带和传入的日译本的数量比原文作品要更多，另一方面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译介欧美国家诸种文学作品，间接上更满足我国当时对于新小说阅读和创作的需求。其次是由于译者水平的有限，精通外文的人数甚少，梁启超和包天笑都是“半路出家”的译者，本身日文和英文水平都比较局限，梁氏在约1899年开始才用自创“和文汉读法”<sup>14)</sup>来进行速成式的日语学习，而包天笑起初只是跟随朋友在教书期间短暂学习了三个月的日文，之后也有意挑选中文夹杂更多的译本来进行翻译，才慢慢积累起翻译小说的能力。“搜求旧小说，有两个条件，一是要翻译自欧美的，一是要中汉文多而和文少的。”<sup>15)</sup>日文和日译本因夹杂中文较多，又两种语言共处同一语系，理解起来较之其他语言容易，这种语言上的倾向也促成了“译读”行为的发生与发展。

其次，这种“译读”也是译者和创作者的主观选择的表现。晚清的翻

13) 宋雪：〈晚清小说中的“末日”与“未来”——梁译《世界末日记》〉，158-177。

14) 和文汉读法：1899年梁启超在与罗孝高一起编纂出版的《和文汉读法》中介绍的一种运用中国的语法特点学习日语的一种速成方法。

15)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173。

译观念起始于严复在《天演论》中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信条，虽然“信”在严复看来是一切翻译的核心，但是后来译者大多还是更注重读者对于内容的理解。梁启超在1897年出版的《变法通议》第七章〈论译书〉中曾表达自己对于翻译标准的界定：“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增删之，颠倒之，未为害也。然必译者之所学与著书者之所学相去不远，乃可以语于是。”<sup>16)</sup> 翻译书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深知其意”，因此为了让读者更好的理解译者和作者想要传达的“意”，对原文的“译读”也是必要的，科学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较之其他类型的小说，都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更加陌生，为了更好的传达小说内容和意旨，“译读”在这一过程中表现的更加明显。而进行小说的创作也是为了向读者传达意旨，因此在当时翻译和创作本质上是相通的，翻译小说中的内容和意旨经由“译读”后，被其他作者运用于创作小说中去，不失为一种便捷有效的创作方式，这种观念也促成了同名译作与创作的诞生。

由于译介观念的特殊性导致的“译读”的延伸和发展，使得在晚清时期，小说的翻译与创作活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同名译作与创作，无论是《世界末日记》还是《法螺先生谭》，作品间的内容看似并无实际关系，但却有着相同的联结之处。这种联结体现在作品情节和意旨的表达上。

首先，梁译《世界末日记》和包天笑的同名创作的联结之处在于，二者情节不同但意旨相同。在梁译《世界末日记》中，整篇小说的情节重点在于刻画人类是如何走向灭亡的过程，首先对末日来临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书写，有来自地球气候变化的不可抗力，“人畜之所得居者，惟在赤道下温暖之溪谷，其余诸地，皆成雪碛冰天矣。”<sup>17)</sup> 而科技极度发

---

16) 梁启超著/何光宇评注：《变法通议》，156。

达后对人类自身的危害，也成为末日降临的重要原因：“华灯璀璨，虽夜若昼，人之神经，与之相逐，无寸晷之休息，于是男女平均仅及二十五岁，即消耗其能力以死。”(梁启超，《世界末日记》，103页)在这种末日将近的背景下，男主人公阿美加与其族群为了谋求人类生存而前往探险的过程中，与女主人公爱巴展开了一段末世恋情，最后两人相拥而死，成为整篇小说的高潮与结尾，趣味性和科普性兼具，又给予读者关于“爱”的感叹和深思。但包天笑的同名创作只采用了梁译本中对于世界末日的荒凉场景的建构，并未如译本中那样详细考证了末日降临之原因，仅仅将其归咎于地月碰撞，“月之轨道渐渐接近地球矣，即地球亦转瞬即灭。”(包天笑，《世界末日记》，9页)在此背景下，人类科学家们召开会议迫切找寻拯救地球的良方，但最终会议还未结束，末日就已经来临了。小说整篇相对于译作来说情节简单、场景单一但是对话密集，并包含诸种科学理论对于人类影响，以及人类灭绝后走向何方的终极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中包含了科学性的知识阐释，有对于地球的形成进行物理学解释的部分：“此小瓦斯块者，以分子间相互之毅力，凝集而成椭圆块，更日益收缩，增其密度。”(包天笑，《世界末日记》，3页)也有末日降临原因的原理说明：“此时月之轨道，愈行愈近，而以其吸力之作用则大风潮、大海啸，直夺此地球上大多之生命”(包天笑，《世界末日记》，10页)。也包含了末日降临背景下，传统宗教生死观念与科学进化论观念的冲突，如对于宗教中“极乐世界”的质疑：“依宗教家之言，天堂乃有极乐，或又谓自太阳系统之外，行星何限？恒星亦何限？(包天笑，《世界末日记》，1页)与译作《世界末日记》呈现明显差别。

但是对于在科学态度冲击下包含宗教意味的“末日”探讨，是两篇

---

17) 梁启超：《世界末日记》，《新小说》第一期，102。下同出处不另注释，仅后附书名及页数。

作品联结的关键之处。二部作品以不同的方式不约而同的对传统观念中所存有的宗教意味的末日态度进行了重新思考。包天笑受到严复《天演论》的影响，将宗教中的轮回转世观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连接，认为虽然末日降临，但是宇宙万物是不断进化的，此世界灭亡后，新世界也会接替而至，因此“末日”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宇宙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必经未来数亿万年之后，新世界人之智识灵明，突过前尘，乃能推测而知。”(包天笑，《世界末日记》，13页) 梁启超的“末日”虽为转译之作，但结合当时的翻译文学的“译读”现象，译者在文本中经常会加入符合自己思想的评论和改写，因此这一“末日”也包含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并在译作中与结尾评论出多次展现，与包天笑一样，梁启超同样对“末日”观重新进行了思考，但略有不同的是，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定论，而是提出了疑问“一切皆死，而卿等贪著爱恋嗔怒猜忌争夺胡为者？独有不死者存，而卿等畏惧恐怖胡为者？”(梁启超，《世界末日记》，118页) 既然世界已经灭亡，那么影响人类的各种感情与纷争是否都是无意义的呢？一切皆死之后，能永恒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倡导革新进化后的反拨性的“末日”思考，因此两部作品虽情节上不同，但思想实质上都是一种对“末日”的哲学性的深入思考。

而《法螺先生谭》的译著间也存在着相似的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表现为二者情节类似，但思想实质有别。徐念慈在创作时采用了与译作相同的西方式游记体小说的写法，都以“法螺先生曰”开始，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方法，来展开法螺先生前往各地探险的情节。其次，无论是新法螺先生还是法螺先生，在游历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几次的身份变化。译作中法螺先生时而为战场将领，时而为猎手，后来又变身为船员，在不同的阶段均以不同的身份和职业展开探险，具有典型的西方游记体小说特征。而徐念慈继承了这种特征，笔下的法螺先生由一普通的知识分子，灵肉分

离后变身为超能力之人，在前往各地探险后，归国又大举经商变身成功人士。且译作中出现的法螺先生在北极与熊进行搏斗的情节被徐念慈照搬过来，设置为新法螺先生对五年前的一次经历的回忆，“则於石侧，觅得前五年来游北极下时，被气球载去之日记簿是也。诸君乎，余见此簿，顿令余忆及往事。”<sup>18)</sup>但译作中单纯的与白熊搏斗后射杀白熊的故事，被徐念慈扩写成为一次“氢气球”历险，白熊也不只是想要伤害法螺先生，而是通晓人意般的放过了主人公，甚至帮助他继续游历世界，“熊见余愁闷，俯身踞余前，回首顾余，若令余坐其背者，余悟其意，腾身而上，熊即迈步如飞，越三昼夜，而至北门海峡。”<sup>19)</sup>此外，译作中的外星探险的故事情节也被应用到创作中去，由单纯的月界旅行，被改写成为金星和水星的探险。因此《法螺先生谭》的译作与创作情节的关联是十分密切的。但是相似的情节设置下实质上也隐含了徐念慈与原作不同的思想实质。

相对于创作来说，包天笑的翻译作品的思想较为简单直接，并没有像梁启超在译介《世界末日记》时表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和目的性，在《法螺先生谭》开头的译者前言中，他就直接点明自己的译介动机是“读之能助人奇想”，是出于介绍和传播新小说类型的目的，来进行翻译的，所以较为译本虽然具体内容上有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改写，但是小说意旨仍延续原作，以趣味为主。徐虽继承了译作的游历式小说体，但是游历的方式采取一种灵肉分离状态，并在灵魂漫游的过程中，法螺先生始终怀着一种拯救国民的意图性，在发现自己有发光的超能力之时，法螺先生首先想到的是用这种光来启迪国民，“必有能醒其迷梦，拂拭睡眠，奋起直追，别构成一真文明世界”，（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5页）而在

18) 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原载《新法螺》(小说林社，1905.)，现收录于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13。

19) 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14。

创作中所出现的对于科学知识的罗列与介绍，也远超原著，他扩展了原有的译介文本的科学书写，将主人公的冒险情节都辅以极度“理性”的科学理论来解说，如他在描述主人公灵魂与肉体脱离时，罗列了大量的物理知识以具体说明“因本体之离心力，爆出数十丈外，其余大部分因本体之弹力直上空中，幸也余身失去四分之一，即结合力亦减四分之一。”(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5页)但是同时他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将天马行空的富有西方幻想色彩的科学探险历程，改造为一种“寻祖救民”之旅。主人公地底旅行时所碰到的老人“姓黄，名祖，世居河南”，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汉人之先祖“黄帝”，是一种传统民族意识的唤醒。接下来无论是先祖所持的人性善恶之“气”，或是法螺先生自身所带“脑电”，都带有一种启迪民智，精神救民的目的性，让小说内容更与当时的时代需要相贴合。这种意图包含着作者本人对于科学小说功用性的追求，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谈到：“月球之环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履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则其能鼓舞吾人之理性，感觉吾人之理性。”<sup>20)</sup>明确指出了科学小说的目的在于引进和介绍外国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启迪民智，促进思想进步。这也是《新法螺先生谭》实际上展现出的作者的中心思想。

#### 4、结语

清末民初，时代巨变，各路思想纷纷涌入发生激烈的碰撞，在中西、新旧文化与思想的冲突中，诞生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翻译与创作小说，在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掀起“新小说”的翻译和创作热潮。在这其中

---

20) 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十期，1908年。

不管是政治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还是本文探讨的科学小说，其文本都不仅仅是译者与创作者本身的自我表现，还蕴含了晚清这一时期复杂的文化系统中的诸种文学文化与社会活动的关联。而这四部小说以其特殊的译著关系联结在一起，是翻译活动在进入特定时期的文化系统时所产生和发展的创作结果。

作为科学小说中的代表作品，四部小说以其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其所拥有的科学性、启蒙性的共性特征，两部翻译小说均以自己独特的“译读”方式，对其同名创作产生了影响。而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呈现上，又表现出不同的面貌：《世界末日记》是创作者将译者带来的新体式与新问题的自我发展，译者梁启超将自身的译介与启蒙思想注入译介文本中，而创作者包天笑则进一步内化与整合这一思想，生发出更科学性的考量，由繁化简；《法螺先生谭》则是创作者对译者意图和原作思想意蕴的进一步扩充和民族化，译者包天笑以翻译文本为媒介推介新小说类型，而创作者徐念慈将这一“新小说”内化发展，以自我与民族之思想重新诠释，由简化繁。在这种相互转化与相互吸收中，是译作者与创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文学与时代的良性互动，是异域文本在经由翻译这一媒介手段进入本国文学系统之时，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为探讨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与小说创作的关联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 ■ 参考文献

- 梁启超：《世界末日记》，《新小说》第一期，新小说社，1902。
- 包天笑：《世界末日记》，《月月小说》第十九号，月月小说社，1908。
- 包天笑：《法螺先生谭》，《新法螺》，小说林社，1905。
- 包天笑：《法螺先生续谭》，《新法螺》，小说林社，1905。
- 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新法螺》，小说林社，1905。
- 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 梁启超著、何光宇评注：《变法通议》，华夏出版社，2002。
-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专集第五十九册》中华书局，1989。
-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1971。
-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 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2009。
- 郑意长：《近代翻译思想的演进》，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 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
- 【美】大卫·达姆罗什著/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朱云生：《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 赵中亚：《《格致汇编》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 王晶晶：《新旧之间一包天笑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 赵纪萍：《创造性叛逆视野下的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杨效斌：《清末民初科幻小说新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 郭焕苓：《论梁启超佛学思想对其美学观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 武田雅哉著、钱玮译：〈从东海觉我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说起〉，《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 第2期。

武田雅哉著/王国安译：〈东海觉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考——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史杂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

贾立元：〈“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姚苏平：〈晚清科学小说中的“末日”书写〉，《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王燕：〈近代科学小说论略〉，《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

任东升、袁枫：〈清末民初(1891-1917)科幻小说翻译探究〉，《上海翻译》，2010年第4期。

陆国飞：〈试论中国晚清翻译小说中的“译意”现象〉，《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Abstract〉

Interaction between scientific translation and  
novel of the same name in late Qing period

—take *The Diary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and  
*Mr. Fa Luo Tan* for example

Peng, Ruibin

Since 1902, when Liang Qichao initiated the movement of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Fiction”, the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of new novels have been constantly emerging, and the categories of New Novels have also been increasing in this period. As an important genre of fictio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cience fic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study of New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relevance and differenc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orks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thoughts and the zeitgeist, as well as the acceptance and internalization of foreign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change. Therefore, combining the novel revolu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newspaper activitie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takes these four works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on motivation of translated works, and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multicultural system theory” and “interpretants”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analyzes the particularity of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of science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novel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 the late Qing dynasty, Science Fiction,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Mr. Fa Luo Tan, The Diary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Contemporary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31일에 접수되어 11월 30일에 심사를 완료하고  
12월 10일에 게재 확정되었습니다.